

丁新豹、鄧聰主講：根——香港的古物、古蹟

【編者按：本院第151次雙周會於一月七日在邵逸夫堂舉行，由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及中大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鄧聰博士主講，講題為《根——香港的古物、古蹟》。丁新豹博士演講部分由本刊記者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出來，未經丁博士審閱。】

香港歷史博物館丁新豹總館長 講文物中的香港歷史



丁新豹博士

我最近到廣州參觀西漢南越王墓，從地面看到一層層的地層，地層越深，歷史便越悠久，這就是文化的根。香港市民向來對歷史文化興趣不大，但近來卻引起廣泛關注，例如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及中區警署的發展，市民的熱心關注對社會文化發展都有很大的益處。

由於市民的關注，中環歷史建築物甘棠第得以保存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甘棠第於1974年建成，由富商何東之弟何甘棠斥資建成。兩年前，它的業主末世聖徒基督教會計劃清拆這個古蹟，引起附近居民及政府的關注，最後政府於去年11月花了300萬元購下這座歷史建築物，計劃耗資9,130萬元修葺，改建為孫中山博物館。假如沒有市民的支持，這事情不會成功。甘棠弟是香港目前保存最好的二十世紀興建的建築物，我們必須多謝末世聖徒基督教會，因為這個建築物保存得很好，這不是一般家庭可以做到。它仍然保存完整的木樓梯、完整的玻璃窗，它的落成年期1974仍存在建築物上。最近也有



甘棠第的現貌

人爭論中央警署是否曾經關押孫中山先生而鬧得沸沸揚揚，中大校友曾發表一篇考究的文章，指出孫中山先生並沒有被關押在中央警署。

我的研究興趣在歷史文物。我希望利用香港歷史博物館幾件古物談談香港的古物、古蹟。

香港曾在大嶼山的萬角咀及梅窩發掘出兩塊「食邑稅山」界石。萬角咀的界石現存放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這界石說明大嶼山一段很重要的歷史。「食邑稅山」標誌著朝廷給予某一個族的封邑，所以名為「食邑稅山」，其頂有「李府」二字，屬於姓李家族，是宋朝一個士大夫，並且是一個文學家，名叫李昂英，他有一本著作《文溪集》；他不怕得失權貴，文天祥對他評價很高，晚年他在白雲山隱居，公元1282年被封為番禺開國南。番禺從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現在是廣州附屬的一個地方。朝廷封大嶼山作為他的封邑，因此這界石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文物。現在東涌侯王廟有二石刻碑文，指出大嶼山屬於一家「李久遠堂」的祖業，李昂英後人的一個堂號。香港藝術館收藏的一幅畫與李昂英很有關係，所以文物間很有參考價值。一位畫師畫的一



李昂英常服像



律勞卑紀念碑

幅十九世紀初的珠江外銷畫，畫的中央是海珠砲台，上有一間供奉李昉英寺廟。在三十年代，廣州填海後海珠石給拆掉，成為陸地一部分。從這些古物可以看到有趣的歷史記載。

香港歷史博物館有一件很有價值的文物——律勞卑紀念碑。

1834年英國廢止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壟斷的地位，並派遣特使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到廣州交涉，希望改善營商環境。律勞卑來到澳門，然後到廣州和兩廣總督商談。他沒有按規矩預約拜



位於梅窩的「食邑稅山」界石



1942年2月20日磯谷廉介攝於匯豐銀行總行前

會，兩廣總督著令他先回到澳門再慢慢商量，當時律勞卑不滿，派遣兩艘駐在澳門的戰船攻打虎門，兩廣總督早有準備，在蓮花山水道以盛載石頭的木船阻撓戰船前往，同時兩廣總督對廣州的英國商人表示，如果律勞卑不回到澳門，會禁止十三行在廣州營商、貿易，結果律勞卑沒有辦法，只好回到澳門，而且不久便病逝澳門，當時廣州的英國商人以五百鎊從英國運來律勞卑的紀念碑。這是中英營商長期交涉的一個悲劇，律勞卑在彌留之時遺言只有戰爭才可解決，拉開鴉片戰爭的序幕。所以這石碑見證了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這石碑原放在澳門的中國海關，1963年一位外國船長在一間石碑廠發現了這個石碑，後來香港政府以一百元買回來，放在殖民地墳場，放了幾十年。當我們籌備「香港故事展覽」時，發現這塊重要的紀念碑，因此我們千方百計地把這紀念碑移到博物館放置。收藏這紀念碑困難重重，因取走這石碑必須獲得石碑主人的同意，而這石碑的主人是律勞卑的後人——瑪加烈公主的秘書。後來通過香港的英國領事館得到這位後

人的同意才取得這塊石碑。它見證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這是香港開埠前的事。剛才我說的界石是近來發現的，但它說明的是宋代的歷史，而石碑是香港開埠前的歷史，也和鴉片戰爭有很大的關係。

我再講一個木牌匾的故事。這個木牌匾在日本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的時候，一直掛於設在香港匯豐銀行總行的日本駐香港的總督部門上，所以這牌匾很有價值，發現過程很有趣，正正說明博物館古物的來源有多樣性。大約五、六年前，有一位市民致電稱其家有一書桌，在掉轉的時候，發現有幾個字「香港占領地總督部」，他問這木塊可有用。我們大喜不已，在抗戰勝利後這樣多年，仍可發現一塊這樣有代表性的牌匾。這牌匾是由一位市民的父親收藏。戰爭結束後，匯豐銀行請這位市民的父親開設的裝修公司來清理，這位父親把木牌取回自己家中作書桌。而這牌匾原來由當年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及篆刻家鄧爾雅所書寫。鄧爾雅是當年的總督磯谷廉介在日本讀書時的同窗，而鄧當年逃難到香港，因此這位總督請鄧書寫。當時是日治時代，鄧為日本人寫牌匾不是光榮的事，所以他並沒有署名。據傳，鄧獲得三包米的酬勞，所以後人稱其為鄧三包。因此這塊木牌，既是書法，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物。

我剛才說的三件文物，有石、木、雲石，其實都是不同時期的文物，見證了不同時期的歷史。博物館通過蒐集、整理、研究，展示和保存香港文物。我們現收藏超過十萬件文物。

大家如果發覺家中有什麼文物可通知我們，我們樂於收藏。因為香港的古物屬於香港人的，所以應該盡量保存。

考古與香港尋根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鄧聰



鄧聰博士

黃院長、榮教授、各位來賓、同學們：

今天我的講題是「考古與香港尋根」。尋根的意義何在？古人謂：「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誰想做無根的一代呢！如何尋找文化的根源？這需要一種學術方法，這就是考古學。生命歷史是隱藏在 DNA 的裡頭；人類文化的根源，卻深藏於地殼底下，有待考古學家手鏟的發掘和解釋，才得以重見天日。因此要剖析香港古文化的根底，捨考古其誰！

近百年來考古在人文科學中異軍突起，備受注目。現今考古學已成為人文科學中的顯學。要尋根，就必要從考古說起。我自己是百分百的考古情痴。借此機會，今天和同學們分享一些個人考古的樂趣。

考古能使人如痴如醉的理由很多。出土文物層

出不窮，考古學家不斷享受最新的發現。從遺址中親手捧出千年不見天日的古物，那種激動和奇妙的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然而，這只是考古刺激的快樂的起點。在室內對出土文物深入的觀察，迫近歷史的真相，創造知識的快感，「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

第二個讓我熱愛考古的理由，是考古研究的基本取向，超越國家及民族主義之上。狂熱愛國主義很容易使人們的理性停頓於國境的邊界。而古文化的分布，往往不受國界所拘束。考古學的目標是「人類科學歷史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的重建。現今生命科學與考古學均傾向認同，世界人類同源和現代人起源於非洲的假說。DNA 考古學家正準備就緒為生物的來龍去脈，重新譜寫科學的歷史。考古學在尖端科學高照下，正逐步揭開古代人類神秘的面紗。甚至我們可以稍誇張地說，考古學家從時光隧道的狹縫中，偷窺上帝創造人類的秘密。

考古的對象，包括一切與人類相關的遺物和遺跡，譬如人和動植物的遺骸，甚至糞便等，都可以成為考古學研究重要的對象。過去十多年我在中文大學教學，曾以「廁所考古學」專題教授，意外地引起同學們的興趣。我曾在日本仙台參加發掘的富澤遺址，就出土過上萬年前鹿的糞便，由於在地下水的良好保存條件下，鹿糞新鮮出土之際，糞粒外帶透明的黏膜，光可鑑人。近年世界廁所考古學的研究碩果纍纍，考古學家已發掘出很多數千年前人類糞便的化石。根據廁所內的糞便堆積，可以發現寄生蟲卵、昆蟲遺體和花粉等密集在一起，從而推知古人的食物和疾病，甚至可區別男女性的廁所。

日本考古學家在七世紀末藤原京的廁所內，意外發現很多曾用作習字的木簡。這些木簡最終的用途，不言而喻。這使我聯想起香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窮家子弟，常把習字後的草紙當廁 (手) 紙使用。真是太陽之下無新事。現今「廁所考古學」在歐洲和日本已成為很熱門的學科。單此舉「廁所考古學」一端，就可知考古門路之新鮮和吸引，具有發覆千古之威力。

考古學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科學，又和自然科學有著廣泛的配合。它的活動範圍被形容為「上窮碧落下黃泉。」包括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利用遙感衛星圖像或在飛機中觀察古代廣大的遺跡，據此中國古代絲綢之路行蹤，呼之欲出。入地，中原三代兩漢的古墓，一般都深藏於黃土地下數以十米深的土層中。不深入黃土，焉得古物。下海，東南亞的沿海，海上陶瓷之路沉船無數。水下考古，方興未艾。現代考古學的空間，可以說是無孔不入。考古學家野外的的工作，是汗流浹背強體力與運籌帷幄智力的結合。近幾年我們在越南北部野外工作，天未亮即下田野，直至太陽西下，晚上標記文物，不亦樂乎。田野發掘工作完成後，回到室內整理文物，既要有老僧入定的功力，抱著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情懷，直至把報告完成。

地不愛寶，總把金針渡與人。二十多年我在港澳、南中國以至東南亞考古的經歷，所見古文化如遍地黃金，俯拾即是。如香港國際機場赤鱗角地下，就出土東亞地區最古老製作樹皮衣服的石拍工具，對人類衣服植物無紡織布起源歷史問題的解決，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為此這幾年我踏破鐵鞋，在南中國及東南亞各地調查，初步復原東南亞早期



眺望香港中文大學之吐露港 6,000 年前丫洲遺址

人類樹皮衣石拍幾大的體系。另一方面，在距今三至四千年前，香港及珠三角出現了很多製作環狀飾物的聚落。這些資料在中國玉文化的歷史研究，同樣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目前我正著手從香港古代玉作坊入手，探索東亞玉器製作工藝的源流。今年我將與俄羅斯考古學者合作，自西伯利亞以至中國東北一帶調查。西伯利亞與香港都發現過相似的史前玉器飾物。地球村的概念並非為近代專美。

為切合今日談話主題之一香港文化的尋根，以下再抽出數項歷年在港澳考古的發現，與諸君共賞析。

其一：中大吐露港丫洲 6000 年前人類居住遺跡發現。



南丫島大灣遺址利用高空拍攝紀錄房子遺跡

其二：史前船民說不攻自破

一九九六年，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南丫島發掘到 6000 多年前的聚落遺跡，其間揭露出兩座新石器時代的房基，居住遺跡呈圓形，中間有石砌火塘遺跡，四周分布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石器和陶器碎片。這是目前我們所知香港發掘後。

鞍山蒼蒼，吐露洋洋。如詩如畫中大的校景，豈能無古人的蹤跡。可惜崇基及中大建校初期未有考古工作！1988 年我和中大同學在吐露港孤懸小島丫洲揮鋤發掘，在地表三、四十公分泥土下，發現了不少殘破陶器和石器，後來經中大理學院熱釋光年代測定，為距今 6000 年前的文物。這一下把吐露港的人文歷史，回溯到數千年前深厚的基礎上。大埔黃肇枝中學、林村河谷一帶都發現過三千多年前青銅器時代的文物。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中大山頭一帶，尚否有古可考，有待諸君揭秘於日後。

最後因為時間關係，這裡我只能提綱挈領勾勒出古代香港文化根源的一二。從整體來說，香港是珠三角的一部分。珠三角與南中國古文化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嘗試用一個多源層疊構造的假說，去理解香港近 6000 多年來人類文化形成的過程。



1990 年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國寶牙璋

到最古老的房屋遺跡。殖民地時期本地考古愛好者發掘不到房子的遺跡，提倡香港古代居民是在船上居住。近十多年來我們在大嶼山各地，發現大量不同時期聚落房子的遺跡。香港古代居民為船民的神話，不攻自破。

其三：商時期國寶牙璋的發現

一九九零年是我們相當幸運的一年。我們和中山大學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發現了十數座商時期的墓葬。其中第六號墓出土極為罕見的牙璋和串飾，是現存香港出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牙璋玉器。這件玉器在九七回歸當年，在香港藝術館「國寶」展覽中曾公開亮相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楊伯達教授一再表示，這件玉器為中國的國寶。

(轉下頁)

(接上頁)

其一是西來說：在五、六千年前，香港（以南丫島大灣遺址為代表）受到來自西江一帶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影響，其中本地出土白陶和彩陶，更是湖南稻作農業化身的使者。在這期間，長江中游特別是湖南南方的古文化，對本地影響是既強烈又直接的。當然，本地在吸收外來文化後，又鑄造本身的特色。香港出土大量的彩陶，由流水和浪花構成數十種的圖案造型，是中國彩陶中唯一以水為主要題材傑出的藝術品，也是海洋文化的具體反映。此時期珠江三角洲共同文化體系的網絡已形成。

其二是東來說：在距今三至四千年前，香港一帶又受到來自東南沿海原始文化猛烈的波及。在前一階段的幾何印紋陶時期（以屯門浪湧文化層為代表），本地受到了來自福建壘石山文化明顯的滲透。在後一階段相當於中原商時期（以南丫島大灣

上文化層為代表），在閩南及粵東沿海的浮濱文

化，得以在本地長驅直入，誘發了香港地區青銅文化的出現。大灣牙璋的橫空出世，無疑是當時階級貴族的用品和酋邦社會政治的工具。

其三：距今二至三千年間本地是古越文化的地盤。受北方戰亂影響，本地沿海已被籠罩在相當緊張的戰爭社會氣氛中。此時聚落的選址，傾向轉移至較高山崗的台地，握居高臨下進可攻退可守優勢。遺址中較多出現戰士的墓葬，陪葬死者生前所愛用的戈、矛、劍和斧等殺人兵器，估計這些青銅兵器大多是通過以物易物從外地入手。在此時期香港地區沿海，已形成較密集環狀飾物生產的專業集團，所生產水晶等飾物在三角洲腹地有很廣闊的消費市場。同樣是以物易物的手段，本地換來生產於三角洲腹地精美的硬陶。

秦末漢初階段，香港已在南越國國土的範圍。九龍李鄭屋漢墓的發現，確鑿顯示香港一帶已直轄

於漢朝中央政府。殖民地以前香港的歷史，又豈是「一條漁村」所能概括。

香港6000多年來人類歷史的神秘面貌，在考古揮鋤下已略露端倪。我期望同學們對香港文化的根源，有所認同和理解。「養其根而俟其實，……根之茂者其實遂。」養根，就先要從反求諸己，認識自我文化的根源入手。可惜現今香港社會，仍很少認識到尋根的重要性。唐韓愈謂：「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既樂且悲的慨嘆，於我有戚戚之感！在今天的社會中，香港文化尋根，尤只是一句無關痛癢的政治口號。

後記：筆者於2005年1月7日應新亞書院的邀請，在邵逸夫堂雙周會上發言。本文是按草稿加筆訂正而成。

鄧聰

乙酉正月初二定稿於懷柔堂